

从《方言疏证》看戴震的训诂特色

徐 玲 英

(安徽大学 学报编辑部, 合肥 230039)

摘要:作为清代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反复强调训诂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一套科学的训诂方法。从《方言疏证》可以看出,戴震训释词义不仅利用传统的形义互求法,而且利用音理知识,本之六书,因声求义。他还利用异文,推本求源,从而沟通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为做到言而有据,戴震又参之群籍,综核条贯,形成了鲜明的训诂特色。经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的弘扬光大,以词义考证为主要旨趣的考释终于蔚为大观,成就了我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戴震;《方言疏证》;训诂特色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6-0109-05

戴震于《古训》中云:“盖土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1]三册,503}时间的流逝如同空间的离隔,文字、语音、词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加之文字上古今字、通假字的运用,使得往昔妇孺皆知之事,今人难以明了。为消除时空的隔膜,训诂应运而生。到了清代,由于乾嘉古音学方面取得的空前成就,加之西洋文化科技渐入中国,学者们受到了科学的熏陶,眼界开阔,方法精密,以词义考证为主要旨趣的考释终于蔚为大观,成就了我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作为清代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反复强调训诂的重要性,批判宋、明以来空谈义理、轻视训诂之弊。他于《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六册,370}又于《与段若膺论理书》中曰:“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1]六册,543}要真正把握存在于经典之中的大道,就必须弄懂文本,确切地了解经典字词之义,由词以通其道。所以戴震重视字书研究,以《方言》为《尔雅》、《说文》

外最切于治经者,又有感于“宋元以来,六书故训不讲,故鲜能知其精核”,开始研究《方言》,以期“俾治经、读史、博涉古文词者得以考焉”^{[1]三册,6}。《方言疏证》集中地体现了戴震的训诂思想和特色^{[1]三册,1-250}。

一 本之六书,因声求义

戴震利用哲学思辨中“本体”与“器用”的关系,对传统的六书提出了“四体二用”之说。他于《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曰:“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相转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1]三册,384}也就是说,指事、象形、谐声、会意为造字之初的造字方法,转注、假借是之后的文字运用。因为“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

收稿日期:2010-09-0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重点项目(KJ2010A021)及安徽大学2008年引进人才项目(02303135)。

作者简介:徐玲英(1972—),女,安徽无为,文学博士,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所以理解古籍必须本之六书,否则就会“纲领既违,讹谬日滋”^{[1]六册,295}。文字创作之初的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和形声字,“其形体和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汉字构形的基本意义往往可以从字形的考察与分析中显示出来”^{[2]200}。因此,以形求义是常用的传统的训诂手段。然而,诚如《训诂方法论》所说:“‘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必须在本字、本意和笔意三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而古代文献中直接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情况又是较少的。因为,文字的发展恰好向与这三个条件相反的方向前进:词义不断通过它的基本运动形式引申而发生着变化,引申是多向的,又是多层的。引申的层次越多,引申义与本义的距离越远,与原始形体的联系也越模糊。造字与用字的表音趋向越来越突出,同音借用使本字不通行的情况日益增加。加之文字隶变、楷化,再加上后来的简化,已经完全成为一种符号。笔势占了绝对优势,而笔意早已不复多见。这就使‘以形索义’的障碍越来越多。”^{[3]69-70}戴震较少分析字形,他通常反其道而行之,以义求形,实现形义互求。例如《方言》卷六:“祛,去也。”《疏证》:“《荀子·荣辱篇》:‘祛于沙而思水。’杨倞注云:‘祛与祛同。《方言》:‘祛,去也。齐赵之总语。’庄子有《祛筐篇》,亦取去之义。’此所引作‘衣’旁,本书乃作‘手’旁,《广雅》:‘祛莫,去也。’义本《方言》而字又异。古书流传既久,转写不一。据‘祛摸犹言持去’一语,二字皆‘手’旁为得。”^{[1]三册,110}戴震对古人用字无定体的现象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主张规范用字,所以通过以义求形,在“祛、祛、祛、祛”中确定“祛”为正字。

在文字的形、音、义关系中,音义关系更为密切。凡有声语言自出现之日起就是音义的结合体,此后出现的文字不过是记录这个结合体的符号。正如黄侃所说,“三者(形、音、义)之中,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4]93}。因此通过对汉字声音线索的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即因声求义之法才是真正的训诂方法。戴震深谙此理,他于《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中说:“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义何以得?训诂音声,相为表里。”^{[1]六册,374}于六书中,因为有假借之存在,所以训诂还必须晓声韵,“本之音声”。章太炎说:“对转之理,戴氏发明之,孔氏完成之。前之顾氏,后之段氏,皆长于韵学,短于音理。江氏颇知音理,戴氏最深,孔氏继之。”^{[5]26}由于戴震精通音理,故其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义由声出”、“一声之转”的训诂原理,“首先提出了训诂的原理和方法”^{[6]18}。

戴震不仅系统地提出了“义由声出”、“一声之转”的训诂原则,发掘出书面文字形体掩盖下的字音义关系,而且为寻求音义通转的法则,特意作《转语二十章》以发明“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学士茫

然,莫究所以,今别为二十章,各从乎声,以原其义”,使学者“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1]六册,305}。

《方言疏证》可以说是戴震因声求义理论的运用。戴震紧扣借字与本字音同(音近)的语音标准来发明通假,并旁搜曲证、多方确考,力求有理有据,语无虚发。如《方言》卷十二:“菲、忒,悵也。”《疏证》云:“菲亦作蕙,《广雅》:‘蕙、忒,悵也。’义本此。曹宪音释:‘蕙,音翡,又芳尾反。’应即‘不悱不发’之‘悱’。”^{[1]三册,186}《尔雅》释“菲”为“蕙菜”^{[7]99}。“菲”,《广韵》芳尾切^{[8]44},上古音微韵旁纽。《论语·述而》:“不忿不启,不悱不发。”朱熹注:“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9]95}“悱”以“非”为声符,与“悱”字音同,“非”因假借而具有悵义。同时,戴震还运用“一声之转”等术语,说明语言的空间音变。指出这种音转字异的语言现象,有利于以雅言通方言,以及方言之间的互求。例如《方言》卷十一:“蝇,东齐谓之羊。陈楚之间谓之蠅。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蠅。”《疏证》云:“‘蝇’、‘羊’一声之转。羊可呼蝇,蝇亦可呼为羊。方音既异,遂成两名,书中皆此类,注以为不宜别立名,非也。”^{[1]三册,179}“蠅”,《广韵》余陵切^{[8]179},上古属蒸韵定纽。“羊”,《广韵》与章切^{[8]150},上古属阳韵定纽。蝇、羊同纽双声,蒸阳韵部旁转。“羊”字仅仅是因地域音变而另用的新字,它们所表达的概念是相同的。再如《方言》卷五:“釜,今连枷,所以打谷者。宋、魏之间谓之撮,或谓之度。”《疏证》:“‘度’、‘打’一声之转。”^{[1]三册,91}“度”,上古音铎韵定纽。“打”,上古音耕韵定纽。定端旁纽,铎耕旁对转。宋、魏之间称釜为“打”,是以其功能而得名,又因方言音转而记为“度”。

戴震精通音理,审音与考古并重,创立了完整的阴阳入相配系统,正式提出声、韵正转、变转之法。戴震的古音理论受到王国维的高度评价,他以为戴氏数人的古音成就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戴震)在古音学上有这么大的成绩,所以对于六书训诂特见甚多”^{[1]七册,576}。戴震将其古音学知识和音转理论运用于《方言》的训诂,利用音同音近关系,或突破文字形体,以破假借;或用音转以明方言音变,沟通方言词。因声求义之训诂方法是戴震训诂的精髓。黄侃说:“以义训者,苟取以相明,惟声训乃真正之训诂。”^{[10]190}“因声求义”为传统训诂学提供了一种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周祖谟盛赞戴震因声求义之法,曰:“清代学者在训诂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沟通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研究文字和字义必须理解声音,不理解声音就无以解决文字形体上所不能解决的语言符号,所以必须了解文字的声音,从声音去探求意义。戴震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这是很重要的见解……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训诂的准绳,从而建立了许多推考字义的理论和方法,把零散的知识贯串起来,使训诂学在中国语言学科中成为有系统,有理论,有严谨方法的一门学问。”^{[11]311}

二 利用异文,推本求源

作为文字学术语,异文是与“正字”相对而言的,是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等的统称。把握汉字系统,分析汉字的通用、假借、古今变化以明词义,这显然是在利用汉语的字与词之间的天然联系为词语解释寻求切实途径。利用异文相互比较是印证释义正确性的有效方法。戴震重视异文现象,他尝语程瑶田曰:“《尔雅》《说文》二书,宝书也。其异文处,则互有得失。”^{[1]七册,276}并自称“欲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1]六册,377}。戴震于《方言疏证》中沟通古今,辨明本假,明析流变,探究词源,无处不渗透着他对于文字学知识的归纳总结。他利用异文作了大量的训诂、考证工作。据初步整理,《方言疏证》中戴震共系联异文 330 多例(引文不在研究之列)。

异文的根本特点是差异性,而具有差异性的双方又有一定的联系,这是异文双方的对立统一。由于产生异文的具体原因不同,互异双方的内在联系亦不同。通过对戴震《方言疏证》中所系联的异文的形音义关系和具体形成原因的考察,我们将其归纳为四种基本类型,即异体字、通假字、同源词和古今字。所谓异体字,就是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除了形体上的不同,其在音义和用法等方面都是相同的。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的人根据不同理据创造文字,一旦都得到社会承认,便产生了异体字,异体字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尤其在记录方音的《方言》中。正如王宁所说:“利用字形探求词义的时候,多一个形体,便可以多一个考音考义的资料,使词义推求更为准确”,“归纳记录同词的异体字,以便由多方面探求形义统一,是训诂学的一项必要的工作”^{[12]28}。《方言疏证》系联的 330 组异文中,有 109 组为异体字。例如《方言》卷十:“寐,安,静也。江湘九嶷之郊谓之寐。”《疏证》指出:“‘寐’各本讹作‘冢’,笔画之外,遂成或体。《说文》云:‘冢,无人声。’《楚辞·远游》‘野冢漠其无人’。‘冢’亦或作‘冢’。江淹《别赋》‘道已寂而未传’,范蔚宗《乐游应诏诗》‘虚寂在川岑’,李善注并引《方言》:‘寂,安,静也。’寂即‘寐’。《广雅》:‘寐,安,静也。’义本此。”^{[1]三册,158}“寐”字罕见,戴震通过系联它的异体字,达到疏通“寐”之为静义的目的。郭象《庄子注》:“槁木冢莫。”陆德明《经典释文》云:“本亦作寂。”^{[13]1427}《广韵》:“寂,前历切。静也,安也。冢,上同。寐,亦同。”^{[8]503}可见“寂”、“寐”、“冢”为一组异体字。

通假关系型异文一方为本字,一方为本字的假借字。两个字在意义上没有关联,仅读音相同或相近。通假即用字的假借,它是古人的一种用字习惯,指在行文中不用本字而临时借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音同或音近字的临时替代有悖于汉字形义的约定俗成,造成了文字的形义分离。因此,若拘于字形强为之解,必致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而即形索音,执音破形,则可以怡然理顺、得古人用字

之真谛。对此,戴震有异常清醒的认识。他于《六书音韵表序》中明确指出:“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在《方言疏证》中,戴震处处联系声音,发明通假。如《方言》卷三:“差,间,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差,或谓之间,(言有间隙)或谓之知。知,通语也。”《疏证》云:“孔安国注《论语》‘少间’云:‘少差曰少间。’《广雅》:‘知、瘥、薙、除、慧、间、瘳,愈也。’义本此。‘差’‘瘥’古通用。”^{[1]三册,62-63}《说文》:“差,贰也。差,不相值也。”^{[14]148}“差”为“愈”者,因“差”“瘥”二字音同通用。

同源词出自同一语源,“在同一词族中,派生词的音和义是从其语根的早已约定俗成而结合在一起的音和义发展而来的,因此带有历史的可以追索的必然性”^{[3]80}。戴震利用同源词意义的可追溯性,探求词源义,疏证词条。例如《方言》卷二:“壤,浑,臙,臙,泡,盛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语也。陈宋之间曰臙,江淮之间曰泡,秦晋或曰臙。梁益之间凡人言盛及其所爱,伟其肥臙谓之臙。”《疏证》指出:“《汉书·贾邹枚路传》‘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阳’,晋灼曰:‘扬雄《方言》:梁益之间,所爱讳其肥盛曰壤。’……《说文》:‘益州鄙言人盛,讳其肥谓之臙。’《玉篇》引《方言》:‘臙,肥也。’今《方言》各本作‘凡人言盛及其所爱,曰讳其肥臙谓之臙。’明正德己巳影宋曹毅之刻作‘曰伟’,皆衍‘曰’字。……臙、壤古通用。《广雅》:‘臙、泡、臙、浑、肥,盛也。’义本此。”^{[1]三册,32}《说文》:“壤,柔土也。”^{[14]452}《释名》:“壤,臙也,肥濡意也。”^{[15]10}《书·禹贡》:“厥土惟白壤。”孔颖达注:“无块曰壤。”^{[16]146}《玉篇》:“地之缓肥曰壤。”^{[17]23}《说文》:“益州鄙言人盛,讳其肥,谓之臙。”^{[14]131}“壤”指土地肥盛,“臙”指人肥盛,二字皆以“襄”为声符,上古音为阳韵日纽,为一组同源词。

古今字是一个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书写形式。戴震具有时间观念,常利用今字疏通古字,系联出一部分古今字。文字的古体字和后起字笔画形体不同,戴震说其古今变化而明其字义。例如《方言》卷十三:“涅,休也。”《疏证》:“《广雅》:‘溺,涅,没也。’‘休’即古‘溺’字,曹宪《音释》:‘涅,乃结反。’”^{[1]三册,218-219}“休”字罕见,戴震指出“休”为“溺”之古字,其释为“没”便顺理成章。《说文》:“休,没也。从水从人。奴历切。”^{[14]37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溺”下云:“今人用为休没字,溺行而休废矣。”^{[18]557}

张相在《诗词曲语辞汇释·叙言》中说:“有以异文印证者。同是一书,版本不同,某字一作某,往往可得佳证。”^[19]赵克勤也说:“古人在引用前人著作时常常有同义词替换的情况,这就构成了大量的异文。……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不同版本或不同书籍的异文来研究这些词的词义。”^{[20]78}戴震通过系联异文,揭示异文之间同源、假借以及古今关系,从而达到由深至浅疏证《方言》词条的目的。

三 参之群籍,综核条贯

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盛清学者之学风概括为十大特点,前五点为:“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三,孤证不为立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五,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21]40}说的正是乾嘉学派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的学风。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凭借深厚的小学 and 文献功底,自觉地把语言文字和文献资料贯通起来,“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其《尔雅注疏笺补序》云:“《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为之旁摭百氏,下及汉代,凡载籍去古未遥者,咸资证实,亦势所必至。”^{[1]六册,276}又曰:“广搜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1]六册,377}

戴震《方言》研究便采用了这种字书、经传互证之法。研究之初,他把《方言》写于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之上,实现《方言》与《说文》的互证。此外,戴震《方言疏证序》指出:“张揖《广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作,不加所引用书名……盖是书汉末晋初乃盛行,故举以为言,而杜预以释经,江琼世传其学,以至于式。他如吴薛综述《二京解》,晋张载、刘逵注《三都赋》,晋灼注《汉书》,张湛注《列子》,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其子骅注《史记》,及隋曹宪、唐陆德明、孔颖达、长孙纳言、李善、徐坚、杨倞之伦,《方言》及注,几备见援引。”^{[1]三册,6}戴震言下之义,凡晚成于《方言》的《说文》、《广雅》等字书,以及其他援引《方言》或郭注之书,它们广采《方言》成说,皆足以为考订《方言》之资。此外,先成于《方言》的字书《尔雅》和先秦文献,它们同为记录古代的客观事物,而客观情况多同少异,故先成之书戴震也引以参照比较。这些同类之书、“备见援引”的材料皆是疏证《方言》的有力佐证。例如《方言》卷十二“鞅,怗也”条,为疏证“鞅”义,戴震援引同时代和稍后文献《史记》《汉书》,曰:“《史记·伍子胥列传》:‘常鞅鞅怨望。’《淮阴侯列传》:‘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又《高祖本纪》:‘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绛侯世家》:‘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汉书》皆作‘鞅鞅’,颜师古《注》云:‘鞅鞅,不满足也。’”^{[1]三册,192}据史料和古人训诂可知,此所引数人皆有不满情绪,正可帮助理解“鞅,怗也”之义。又如《方言》卷三:“露,败也。”《疏证》:“露,见也。《春秋昭公元年左传》‘勿使有所壅阏湫底,以露其体’,注:‘露,羸也。’《易》‘羸其瓶’,注:‘羸,败也。’故有败露之语。”^{[1]三册,56}戴震利用文献与古注,用递训的方式证明“露”“羸”“败”三字

同义,最后总结为“露”即败露之义。

为疏证《方言》,《方言疏证》一书引用书目达 101 种,共采书证 3268 条。所引书目涉及经史子集各部。经部主要有:《周易》,晋王弼注,唐孔颖达疏;《诗经》,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古文尚书》,汉孔安国传,晋王肃注,唐孔颖达疏;《尚书大传》,汉伏胜撰;《周礼》,汉郑玄注;《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仪礼》,郑玄注;《大戴礼记》,汉戴德撰;《春秋左氏传》,东汉服虔注,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其中,小学类主要有:《尔雅》,汉舍人注,汉魏间孙炎注,晋郭璞注,宋邢昺疏;《说文解字》,后汉许慎撰,徐铉本;《广雅》,魏张揖撰;《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毛诗草木虫鱼疏》,晋陆机撰;《玉篇》,晋顾野王撰;《广韵》,宋陈彭年撰;《类篇》,宋司马光撰;《说文解字系传》,南唐徐锴撰。正史类主要有:《史记》,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汉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后汉书》,宋范曄撰;《三国志》,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子类主要有:《荀子》,战国荀况撰,唐杨倞注;《老子》,春秋老聃撰;《列子》,周御寇撰,晋张湛注;《庄子》,战国庄周撰;《淮南鸿烈》,汉刘安撰,高诱注。集类主要有:《楚辞》,汉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文选》,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乐府诗集》,宋郭茂倩辑;《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撰;《初学记》,唐徐坚撰;《太平御览》,宋李昉等撰。

其中,《尔雅》和《说文》征引较多。《说文》出现 393 次,《尔雅》162 次。频繁的征引,是由于它们与《方言》的密切关系。不仅戴震说“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广雅》多本《方言》”,何九盈于《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也分析了《尔雅》《说文》与《方言》的关系:“许慎不仅引用经典证词义,还引用了四十多种方言为证。《说文》出现的方言地区有古国名,如秦、晋、韩、宋、赵、齐、吴、楚等,州郡名有梁、益、青、徐、汝南、陈留、河内、陇西等,所证词义有 170 多条。这些方言资料,有的取材于扬雄的《方言》,有的是他所熟悉的家乡话,有的也可能是‘博问’而来。”^{[22]65}“‘正名命物’是《尔雅》的第一个目的……正名的另一个内容就是释方语,以雅言为标准,比较各地有关的方言词汇。”^{[22]28-29}《尔雅》《说文》与《方言》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可相互发明之处自然较多。

余嘉锡于《古书通例绪论》中说:“治学所以必读古书,为其阅时既久,亡佚日多,其卓然不可磨灭者,必其精神足以自传,譬之簸出糠秕,独存精粹也。”^[23]戴震推崇古书传注,以为舍古而无以求是,故其遍览群籍,博观约取,疏证《方言》时,征引古书传注,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传统的以形索义、音义互求的训诂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文献资料的佐证,则有望文生义、滥施声训,或者孤证不立、言而无据之嫌。陆宗达说:“探求字义不能只凭字形附会,必须核证文献语言,做扎扎实实的调

查研究工作,才能使形义的统一关系反映无误。”^{[3]72}“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必须核证于文献语言,也就是必须从实际语言材料中找出信而有征的佐证,以避免主观臆测,妄作推断。”^{[3]123}所以戴震训诂本着“征之古训,协于时中,充然明诸心而后得所止”^{[1]六册,11}的原则,广征博引,上至先秦诸子,下达时哲通人。徐廷灿称其是“有一字不准六经,一字解不贯群经,即无稽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1]七册,23}。戴震对考据的要求是准确无误,这样就保证了他的结论往往是不容置疑的。

戴震远承东汉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近接清初实学之风,致力于朴学,提出了因声求义、形义互求,以及文献互证之训诂方法^{[24]101-107}。他尝云:“夫援《尔雅》以释《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

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音、声,确然于故训之原,庶几可与于是学。”^{[1]六册,275}又曰:“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1]六册,371}为求一字之“的”解,戴震不仅本之六书,分析形体,发掘文字形体所寓之义,同时还了解古音,由音索义,实行音义互求。他还利用前人训诂成果,汇综群籍,择善而从,形成了鲜明的训诂特色。戴震以《方言疏证》的实践向世人昭示其字书研究之科学方法,并深刻影响了段玉裁、王念孙等一代弟子。他们继承并发扬了戴震的训诂方法,引而申之,补所未备,所著《说文解字注》和《广雅疏证》成为小学研究的巅峰之作^{[25]89-95}。诚如胡朴安所说:“二百年来,确有治学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基础,衣被学者,至今日犹享受之而未尽,则休宁戴东原先生其人也。”^{[1]七册,171}

参考文献:

- [1]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M].合肥:黄山书社,1997.
- [2]白兆麟.新著训诂学引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 [3]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 [4]黄侃.声韵略说[C]//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
- [5]章太炎.国学略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6]洪诚.训诂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 [7]尔雅[M].郭璞注.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陈彭年,等.重修广韵[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朱熹.论语集注[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0]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1]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论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2]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 [13]陆德明.经典释文[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许慎.说文解字[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刘熙.释名[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6]孔颖达.尚书正义[G]//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7]顾野王.宋本玉篇[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 [1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9]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3.
- [20]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22]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 [23]余嘉锡.古书通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4]徐道彬.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 [25]徐道彬.论戴震《方言疏证》的学术价值和地位[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4).

[责任编辑:唐 普]